

从边地到中原  
走廊里的风景  
一个家庭与一座边城  
漂泊者的边城古道



# 边地中国

边地是不是桃花源

邊地之現中國叢書

《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边地中国

边地不是桃花源



邊地中國叢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地中国/《光明日报》书评周刊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5

(边地上的中国丛书)

ISBN 7-5004-4511-3

I. 边… II. 光… III. 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概况-中国

IV. D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7646 号

BIANDI ZHONGGUO

邊地上的中國叢書

责任编辑 冯斌

策划编辑 梁枢

责任校对 李小冰

装帧设计 澳格威图文 张勤

技术编辑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电话 010-840294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04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0.25

字数 201千字

定价 29.00元

邮编 100720

传真 010-84017153

装订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印次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序

在边地披沙拣金 .....夏欣(2)

### 从边地到中原

——满族文化的变迁 .....(7)

### 思想访谈

边地是不是桃花源 .....(40)

走廊里的风景 .....(46)

一个家族与一座边城 .....(66)

漂泊者的古道边城 .....(100)

文字边地 .....(142)

### 讲演录

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148)

### 跋

从边地一路走来 .....(154)

后记 .....(158)

## 【在边地披沙拣金】

夏欣

这套文化丛书的蓝本，源自《光明日报》的一批文化主题专版。

起初，我也是作为读者注意到2002年间不时出现在《光明日报》上的那些整版的访谈文字的。我对这些版块留有印象，是因为它使我这个报内人读起来也有些感觉别样，“看上去很美”，无论内容还是形式。

后来我接任《光明日报》图书出版部主任，才确知这个图文并茂、名为“图书视点”的文化主题版，出自这个部门主办的《书评周刊》的一项特别策划，每月一期，先后推出涉及生命学、思想史、口述史、人类学、考古学、诠释学、儒学与新儒学、中西音乐等多个文化主题，力图以“多学科、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从不同角度和支点上用心解读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边地中国》、《口述中国》、《音乐中国》就是从这些精心策划的文化专版中，择出的最具读者缘的三个主题，链接各领域学者的思想，丰富而成，构成“边地上的中国”丛书。

在无论专版还是丛书的组织策划中，“边地”都摆在了举足轻重、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位置上。在丛书的主要策划人那里，“边地”的概念充满奇妙的、云诡波谲的思想魅力，是触发灵感、衍生思想、以至能够进入到文化讨论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当中的独特元素。甚至从它的字形词义，都能读出“异质”的韵味和色泽，显示出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字在传递信息方面的优势，把人带进特殊的语境。由于同在特殊的视角上，无论《边地中国》还是《口述中国》、《音乐中国》，其实都具有某种深刻而微妙的“边地”意味。

也就是说，三本书讨论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都可统称为“边地文化”。

那么，人们对边地文化的关注和向往由何而来？这些处在边缘地带的文化中，究竟有哪些东西构成了它的灵魂和命脉？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边地或边缘文化视为一种有着双重生命的存在：

一重生命突出文化的异质性，是生存环境决定的与生俱来的文化属性。地理上的“边地”奇特而另类，充满原生和古典味，它特殊的地缘、血缘和族缘结构，它的粗犷、妖媚、宁静与苍凉，足以把现代生活中的人的生命感觉重新激活；而口述的“边地”，则带给人们由特定的地方、人群和故事结合而成的生命形态，产生“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困惑；在音乐的“边地”，我们又被拽进中国传统音乐生存状态的“异乡”……

另一重生命与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相联系，它显示超文化的东西，告诉我们的是文化的本质。一种文化究竟能“教化”多少人、覆盖多少地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为人类拥有和共享。“边地文化”的“异”，并不是因为其表现形式的独特，而是思想和文化品格的独特，而思想和文化是没有疆界的。地域文化会为空间所限，精神文化却可以超越时空，为人类所共有。探讨边地文化，最终是要回落到它在全人类大文化层面上的某种共通共融的亲缘关系上来。

这“两重生命”便体现出边地文化的价值存在，它给与我们的思考是多维而立体的……

边地文化应地应时而生，因为差异性与其他文化此消彼长，彼消此长，共生共存，一同支撑起完整的人类文化大厦。文化的整体性、一致性正是以存在差别、差异、多样化为基础和前提的。边地文化本是人类文明得以存在和延续的一个基本元素，在大文化中具有无可替代性。而我们偶一回顾，却常常会让久违的感觉把边地文化的本原意义遗忘掉。

与边地文化相对应的是“中心文化”。所谓“中心文化”，往往不是因为文化的发达所致，其“中心地位”可能更多的是借助军事或经济等文化之外的其他力量建立起来的。今天人们被世界经济带入所谓无国界时代，但并不等于说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差异也随之消失、处在“边地”的文化会慢慢死去。相反，边地文化会在与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欣赏、尊重和有效的沟通中，成为资源和宝藏。再强大的文化也不可能产生大一统的吞噬力量。因此编者的最终想法是靠得住的：边地文化根性不会随之“化”掉，相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正是我们这个世界多姿多彩的原因。

文化是平等的。“边地文化”是相对概念，它更多的时候其实既不是“边地的”，也不是“中心的”，只能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文化不是起源于某种理念，而是源于自然的生活，边地文化从来不为他者生存，而是按照自己的惯性轨迹发展的。这正是边地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品格所在。它与其他异文化的交流一定是双向互动的，这种求同存异的交流为彼此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汤一介先生不久前在一次国际学术论坛上说过很精准的一句话：任何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其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自我。

感觉中的边地文化总是远离现代化的，文化未见得能与现代化一同演进。当我们把自己的家园变成水泥森林，当汽车文化让我们享受速度的时候，“人们的精神世界正日益被逼向计算理性的角落，利益、计算、算计、效率统治着一切，生命、激情、想象和灵感统统都被边缘化了。”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谁能回答，撇开人文精神的科技发展会不会牵引着文化在绕大大的一个弯子呢？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展，但人们永远无法确知当前的坐标。倒是经常寻访一下边地文化，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可能会找到文化校正的参照。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像一些学者所提倡的，“返本开新”——一方面深刻了解自身的文化来源，发掘其延绵数千年、无处不在的真精神；一方面又要利用我们的民族文化资源，做出合乎时代的诠释，创造出新的文化理论；“和而不同”——保持文化和心理空间的流动状态，在和异文化交流、冲突、互动中批判与创新；有“因”有“革”——既因循承继，又变革出新，在与世界文化的融通中，使中国的民族文化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用文化的力量，促使人类社会朝着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千姿百态的图书出版市场，这套丛书也许不会太抢眼，但它的风格和学术个性是鲜明的。

它并不是作者各自领域的学术论著或专题研究，但它仍然是在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只是表述的方式更为轻松便捷，因此在整体的学术把握上是一种“亚学术”状态。主体文字的作者是既有精深的专业研究背景，又有大文化视野的学者，书中涉及的内容丰富多样，但都是与本书主题有内在关联的，其视角、构成形式、体例等均不拘一格，有学者对谈、专题论述、第一人称叙事等多种体裁，还有更为灵活的附属背景文字的编排，加上穿插于主体文字之间的百余幅照片，构成了一个既有机统一又清雅灵动的整体。

文化问题的探索过程也是一种精神生命的行程，它即存在着思想演进的逻辑，也存在着思想者的生命感觉。我感觉由编、作者共同营建的这片亚学术绿洲有学术，也有风情，是在古奥的学术语言之旁，提供了一种绘声绘色的生命阐释、学术阐述的可能性，更能体现和展示思想的魅力。相信这样的“亚学术”书籍不仅能与那些学术专著并存不废，而且在今天的生活节奏中，更能适应不同的阅读心理和旨趣，更能使读者在享受、放松同时，得到思想与知识的快乐。

在《边地是不是桃花源》、《东西方音乐：对话前的对话》、《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真相？》几篇访谈录中，各路学者的对谈出没于中西学海，辩才纵横，妙语解颐，跳跃的思想脉搏、隽永的哲学和诗学意味随处可见。《当传统遭遇现代》的作者用游吟式的语言，述说中国传统音乐的

当下生存状态，精微之处，深藏大意，其淡淡的忧虑，悠悠的思索，不露声色，却给人以触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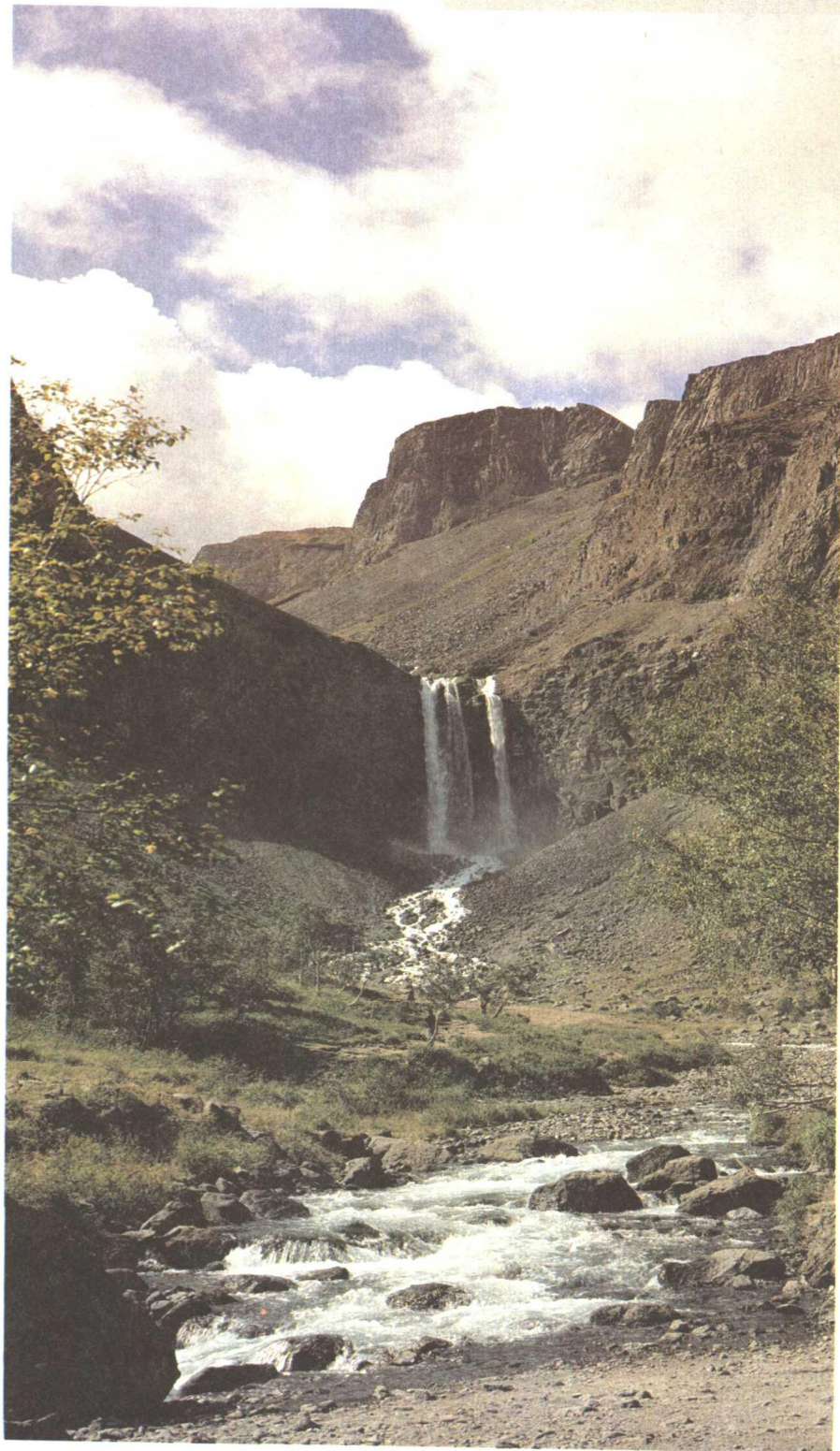
我的前任和王玮、梁枢等《光明日报》图书出版部的编者为此套丛书的出版花费了不少的心思，反复切磋，一些编辑思想还来自在饭桌和吸烟室的辩论。梁枢是访谈记者、编辑和丛书最主要的策划人之一。说实话，他平时的做事状态总似很不经意，目光散淡的样子，但是对编这套书的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执著，从最初动议作文化主题专版，到一步步完善和实现所有的想法的每一个细节，都孜孜以求，乐此不疲。我们部门的工作有报纸的周期追赶着，常常置丛书的进展于不顾，他就只有苛求自己。最后他把书稿在椭圆形的会议桌上摊了一圈，最后征询我们对丛书的版式体例的意见，在王玮提出把一些点评式的文字改为侧批为好的那一刻，梁枢的眼睛亮了，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吐出一个字：“改”，遂又补充：“麻烦也改。”他果然不厌其烦、不厌其繁地完成了这件事。

君子不器。有这样一些常在学理层面游走、又不乏浪漫气质的饱学之士，媒体会少一些因为编辑们的学科局限而延误释放新知的可能，及时给我们的读者、特别是那些有社会责任和研究意识的人一些学术和思想的支点，一些智力和智慧的支撑。

读书、品书包括编书的过程也是精神探索的过程。书的编者、作者经过这次思想旅行，不断在“边地”披沙拣金，收获思想。相信读者也会以自己的理性和悟性，领会书中这些图文背后的精神文化意义，还有其中耀眼的生命感觉。

文化是多元的，也是无处不在的。作为一套“亚学术”文化丛书，可开发的选题很多。如果这些书符合读者的阅读兴趣，大家能够从中学到知识、得到快乐，我们将会继续努力，增加品种，以飨读者。





长白山

## 【从边地到中原】

——满族文化的变迁

刘小萌

以往研究边地民族，大多着眼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如何从文化角度进行认真地探讨，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近年来，日本历史学家正在从事的一个大型课题叫做《中华世界的形成——18世纪狩猎、牧畜、农耕文化圈的接触与融合》，凸现了多元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美国学者马克·欧立德在所著《满洲之道：清朝的八旗制度与民族认同》这部解索满族历史之谜的新著中，试图把满族而非汉族作为清史研究的中心。

满族先世以渔猎采集为生，迁徙不定，无纪年之法。后以绿、红、黄、白、黑五种颜色各分为深、浅两色，表示“十天干”，复以十二生肖与“十天干”对应，依次搭配，周而复始。以六十年为一周期的纪年法脱胎于汉文化，而以十二生肖纪年却是源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在这方面，满人师从了蒙古人，而蒙古人则承袭了突厥等民族的余绪。

——刘小萌《边地文化与少数民族》

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边地少数民族不断入居内地，建立政权，并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留下自己鲜明的印记。北魏鲜卑拓跋、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满洲等北方民族，都曾凭借强劲的武力由边地入主中原。其中，北魏、辽、金，都在中国北部建立了政权。北魏以山西为统治腹地，与汉族的南朝相对立；辽由北部、东北边地扩展到华北；金在淮水以北与宋对峙。而元、清两朝则建立起统治中国全境的中央政权。各王朝的统治年限或长或短，北魏约一百五十年，辽二百余年，金约一百二十年，元百余年，清朝统治时间最长，约二百七十年。五个王朝的统治年限合计约八百五十年，大约相当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的三分之一。这些民族入居内地时，粗犷剽悍，弓马娴熟，无不挟带传统文化的虎虎雄风。然而曾几何时，却无一例外地被以柔克刚的汉文化所同化。在这方面，尤以满族最具代表性。

满族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崛起于东北地区的一个渔猎骑射民族，人口不过数十万，却凭借其强劲的武力，征服了号称有上亿人口的明朝，建立起幅员辽阔的清王朝，统治中国长达267年之久。满族的功业，堪称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满族在军事、政治上空前强大的同时，其文化却不能不为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所陶融。满族的“汉化”，成为中国历史中一个很值得考察的现象。

### 一 从边地到中原

中国东北白山(长白山)(图1)、黑水(黑龙江)(图2)间的广袤地带，是满族成长的摇篮。明朝末叶，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在长白山脉南段的苏子河畔(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崛起的。他召集子弟数十人从这里起兵，开始了兼并诸部的战争。



图1 满族的摇篮——白山(长白山)



图2 满族的摇篮——黑水(黑龙江)

在这个过程中，努尔哈赤以满族人原有的牛录制为基础，创建了八旗制度。“牛录”，是氏族时代的生产和军事组织。行军出猎之际，人们各依所属的族或寨行进，在每10人中立一首领，称“牛录额真”（满语：“牛录”是箭，“额真”是主的意思）。努尔哈赤为把战争中征服来的各部落统一组织起来，规定每300壮丁编为1牛录，每牛录设1个牛录额真；5个牛录组成1个甲喇，设“甲喇额真”；5个甲喇再构成一个固山，首领叫“固山额真”。满语中，“固山”的原意为“部落”，“甲喇”原意为“关节”的“节”，这意味着甲喇是联结固山与牛录的中间环节。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编成了4个固山。这4个固山分别以黄、红、蓝、白四色旗作为标志，于是改用旗色指称之，称作黄、红、蓝、白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又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旗，全称八旗。

八旗组织将以往涣散的村寨、部落联合为一体，它不仅是强有力的军事组织，同时也是卓有成效的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所有的八旗男丁兵农合一，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两事，未尝偏废。战利品除贵族占有大部分外，所余部分“论功行赏”，军费赋役各项开支由八旗通过牛录向众旗人分摊。部落的统一和八旗的编设，奠定了满族国家的基础。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称“汗”，建立了大金国（史称“后金”）。在以后十年里，努尔哈赤凭借所向披靡的八旗军队横扫明军如卷席，将明朝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据为己有。



图3 长白山天池

随着全国政治中心从赫图阿拉迁至沈阳，满族人首次大规模迁入了汉族人聚居的辽沈地区。这以前，由于受北方寒冷气候和山地原始林带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满族的先民长期以渔猎采集为主业，传统的狩猎活动使他们精于骑射。迁入久经汉民垦殖的辽沈农业地区后，满族人开始了由“引弓之民”向“农耕之民”的转变，传统的渔猎文化开始向农耕文化的嬗变。

满洲人的八旗制度最明白不过地表明了满洲集团的非中原的性格特征。除了皇帝外，无论满洲的男女老少，都属于八旗，八旗的历史和满洲的历史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欧立德《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

东北少数民族的多都制，最初源自渤海国。国内有五京。“五京”制度后为契丹人所沿袭。女真人兴起后也随之仿建：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南）、中都（先称燕京，位于今北京市西南）、南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东京（在今辽阳市）、北京（在今宁城县）、西京（在今大同市）。后来，多都制又传给了蒙古人。

——刘小萌《边地文化与少数民族》

明启六年(1626年),清太宗皇太极继承了汗位。十年中,他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全面效仿明朝制度,并于崇祯九年(1636年)宣布改汗称帝,定国号为大清。

八旗组织建立初期,以满族人为主要成分。随着清国疆域的迅速扩大,汉族和蒙古族的降众迅速增多。为适应这种变化,皇太极陆续增编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使之与满洲八旗共同构成八旗制度的整体。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病歿。第二年,第九子福临(清世祖)即位,改年号为顺治。顺治帝即位时年仅6岁,叔父多尔袞和济尔哈朗共同辅政。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袞亲率八旗劲旅闯入山海关,攻克了明都北京。接着,清廷从沈阳迁都北京,很快建立起对全中国的统治。伴随迁都而来的,是满族人口的又一次迁徙高潮。除很少一部分留居辽沈“发祥重地”外,绝大多数人举家携眷、长途跋涉,“从龙入关”。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目睹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

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儿干人、西部的古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鱼皮鞑靼在更加东面,与日本处于同一海拔高度。那里的人被称为鱼皮,因为他们穿用坚固的鱼皮制造的盔甲或胸甲。不仅这样,我还看见很多来自伏尔加河的人,鞑靼人管他们叫“阿尔加鞑靼”(《鞑靼战纪》)。



图4 顺治帝福临的玉册和册箱



图5 沈阳故宫藏石青缎彩绣袂袍

卫匡国笔下的“鞑靼人”,并不是指狭义上的蒙古人,而是包括满洲人和东北沿边地区的其他渔猎民族如赫哲人等。从清初到近代,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人始终以“鱼皮鞑子”称名于世。用鱼皮加工成服装、甲胄,正是这些民族文化中的基本要素。当时,满族人以及同样被编入八旗的部分蒙古族人、赫哲族人、汉族人、朝鲜族人,都随同清朝入关。由于他们统一穿着满式服装,依照满族传统实行剃发,难怪卫匡国要将他们大而化之地统称为“鞑靼人”了。

从历史上看,辽代契丹族和元代蒙古族在建都北京后,大批居民仍留居本族的故地。金代女真族,在海陵王、金世宗后,大举南迁汉地与汉族杂居,从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清朝入关的同时,满族人大举迁入内地,对其自身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满族人远离了世代繁衍生息的“白山黑水”,深入到以汉族人为主体的中原农业社会。此举孕育了满族社会经济的全面飞跃,同时也使它的传统文化遇到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有力挑战。



图6 沈阳故宫藏石青缎平金龙彩绣女朝服

清朝定都北京时,沿用关外旧制,颁布了几条重要政策:强迫汉民剃发易服。明朝,汉族男子都蓄长发、梳髻。满族的传统是男子剃发,即将头顶四周的头发剃去寸余,中间长发分三绺编成一条长辫垂于脑后。除父母丧和国丧百日内外,头顶四周边缘的头发必须及时剃除,不许蓄长,叫作“薙(剃)发”。清朝把汉人剃发,改从满族发式,作为降顺的重要标志。满族的装束仍保持着渔猎时代的传统。由于采猎生产的需要,在装束上,男子穿“马蹄袖”的袍褂,袖口窄狭,上长下短,马蹄袖口盖在手背上,袍两侧开襟,腰束布带,上系小刀、匙、箸等日用品。妇女穿长衫,天足。

清朝在强迫汉族男子剃发留辫的同时,规定他们必须着满式衣冠。不过妇女例外,出家人(和尚、道士、尼姑)和乞丐例外,俗称为“三不降”,头发服饰可不改旧制。当时汉族男子全依满式,妇女则仍按明制凤冠缠足,上衫下裙,所以有“男降女不降”之说。道士修炼,以不剪不剃为玄规;和尚以六根清静、拔除烦恼为三宝律例,头发早已剃去;况且道士、僧人的服装也不便更换。关于他们的发式,又有“长不剃,短不编”的俗谚。乞丐的衣食全是乞讨得来,无钱剃头换衣,所以也在“不降”之列。但乞丐的“特权”未能保持多久。随着清王朝建立起对中国的统治,满族的服装、发式完全取代了汉族的服装和发式。

清朝为了安置迁入关内的大批八旗王公、官兵,在近京五百里内——东起山海关,西达太行山,南至河间,北抵长城——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

清朝建立统治最初的约八十年间,清廷试图通过在北京驻扎八旗和在地方驻防八旗来维持对中国的统治。因此,八旗兵不但进驻了北京,而且于1645年在西安和南京,后来发展到在中国各主要城市都实行局部占领,一共建立起18座“满城”。被派往驻防城市的八旗兵要携带自己的家眷,安置在与当地汉人完全隔绝的满城居住。但是除了北京,无论去哪里驻防,都不得在当地拥有财产。到18世纪中叶为止,旗人如果死亡,其尸体要运回北京安葬。在观念上,清廷对地方城市的占领是一项暂时措施,驻防兵的任务也是临时性的,驻防北京的各旗,仍然是满洲人,北京是所有旗人真正的“老家”。这个人为构筑的观念,正是清朝为了维护作为征服者的满洲集团的纯粹性,防止雍正帝称作旗人“入籍”现象发生的一整套设计的核心。

——欧立德《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

模的圈地，总共圈占 16.6 万余顷。所圈土地，小部分为皇帝及八旗王公贵族占有，建立起官庄和王庄；大部分分给以满族人为主体的八旗官兵作为旗地。

与圈地活动并举的一项政策，是在畿辅地区实行满、汉分居（实际上是旗、民分居）政策。这项政策最初是由顺天巡按柳寅东在顺治元年（1644 年）十二月提出的。他提出：为避免旗人与汉民杂处而生事端，莫若先以州县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满洲人自占一方。而后以察出无主地，与有主地互相兑换，务使满汉界限分明、疆理各别而后。虽然实行满、汉分居的理由被冠冕堂皇地说成是为了避生事端，但在实施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大规模

的恣扰民人事件。凡居住旗地内的民人，通常被强令迁出，土地、房舍落入新迁入的旗人之手。这样，清朝统治者首先在北京城周围方圆五百里内，用



图7 品蓝缎女袍及坎肩

暴力手段强制划定了旗、民的畛域。

在北京城内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入关之初，清廷借口京城内“盗贼窃发”，谕兵部严满、汉分城之制。当时的北京城保持着明朝多次重建后的面貌，呈“凸”字形。内城在北，平面呈东西较长的长方形；外城在南，东西各宽于内城 500 米有余。经过大规模清理，原来在内城居住的汉人无论官民一律迁居外城，而内城则成了清朝皇室和八旗王公贵族、官兵聚居的地区。

居住内城的八旗称“禁旅八旗”，又称“京旗”。禁旅八旗从四面拱卫着内城中央的皇城。八旗的分布，是依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确定的。东方属木，金克木，金为白色，故正白、镶白二



图8 大红江绸彩绣女袍

旗驻东城；西方属金，火克金，火为红色，故正红、镶红二旗驻西城。其他各旗也是按五行生克说确定防地——正黄、镶黄二旗驻北城，正蓝、镶蓝二旗驻南城。又以皇城（紫禁城）中线分左、右翼，东部四旗为左翼，西部四旗为右翼。在各旗防区内又分汛地，汛地内又设堆拨，汛地与堆拨间设立栅栏，设兵值勤。在清初，北京城是作为军事大本营来配置旗兵的，以后城市的军事性质逐渐减弱，但驻防区划仍沿袭不改，直至清末。

清初统治者圈占北京内城之后，这里便成为八旗人口盘踞的大本营，也是一座规模巨大的“满城”。一直到乾隆以后，主要是清末光绪变法之后，汉人移居京师的才逐渐增多，以致外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称内城为“Tartar City”，外城为“Chinese City”，也说明满、汉内外之分。

那么，在这座庞大的“满城”中究竟居住过多少人口呢？由于清朝对禁旅八旗的兵额长期保密，增加了澄清这个问题的难度。一说顺治年间约有8万人，乾隆年间为十万余人。《清史稿·兵志一》则提供了清季京旗官兵的准确数字：职官6680人，兵丁120309人。如果以每一旗兵眷属平均5口计算，京旗总人口当是63.4万余人。这与民国初年北京满族人口60万的统计数字相吻合。

与内城旗人比邻为居的是外城的众多汉人，彼此被一道高高的城墙阻隔。当时北京内外城共有城门16座，内城9座外城7座，俗称“内九”、“外七”。内城9座城门是：北面的德胜门、安定门，东面的东直门、朝阳门，西面的西直门、阜成门，南面的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又称“前三门”）。由于汉官、汉民、汉商集中聚居在外城，所以前三门便成为旗、民往来的主要交通通道。清朝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前三门于每天傍晚下锁，至三更时，惟正阳门开启一次，以便外城的汉官入朝。有些到外城游宴的内城人，也乘这一开城门的机会回到内城中来，当时管这种现象叫“倒赶城”。但只准进不准出，以防贼盗宵遁。



图9 象牙镂雕朝珠

1996年，伊芙林·罗斯基在全美亚洲年会上以前任会长的身份发表一篇演讲，名为《再现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针对何炳棣1967年所写《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所说清朝统治者的“汉化”问题提出异议。她认为，清朝能够在中国成功地维持了近300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不是汉化，而是有效地利用了与内陆亚洲诸非汉民族的文化联系，从这点上说来，满族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而非中国传统王朝的皇帝身份出现的。她认为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很多东西而本身还是保留了诸多自己的特点。罗斯基的说法在美国汉学界反响强烈，颇得好评。

清廷将精锐集于京城，平时镇守中央，有事调集出征。同时，并没有忽略对全国各地的控制。清代汉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绿旗兵。绿营兵有六余万，按标、协、营、汛的建制系统驻扎在大大小小的城镇、关隘、水陆要冲，形成了严密的控制网络。而对这支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加以监视，并对当地居民起威慑作用的，则是驻防八旗兵丁。

八旗驻防制度始于顺治朝，发展于康、雍两朝，迄乾隆朝大体完备。当时，驻扎各地的八旗军队达到十万余人，与京旗的数额大体持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八旗军队屯驻在全国七十处重要城镇和水陆冲要，根据兵力多少各设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只设城守尉、防守尉为其统领，由此构成清朝控制全国的骨干力量。驻防制度的实施，使满族人的分布进一步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他们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南至广州，北抵瑛珲，西迄伊犁，最集中的地方当然是京师和畿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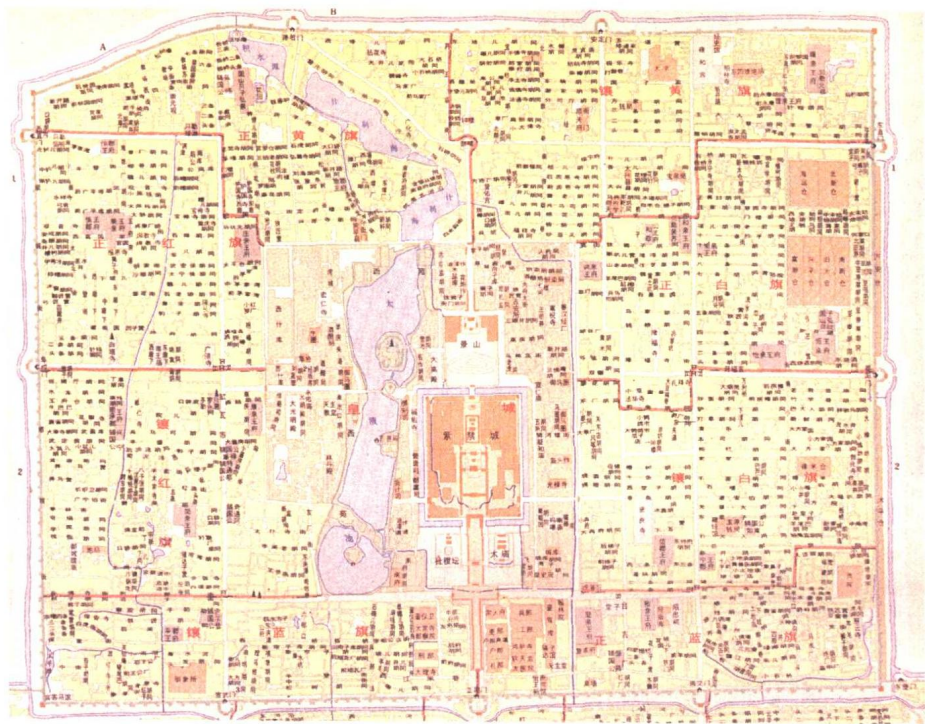


图10 清代北京内城八旗驻防图

驻防旗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后，大部分驻防地处在汉人社会的包围中，一个个旗营，犹如大海中的座座孤岛。清统治者担心的是，驻防旗人沾染汉俗，以致骑射生疏，丧失震慑地方的威力。所以处心积虑地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如规定驻防兵丁生老病死家口俱令还京；又规定驻防官兵不准在当地置产，死后不准在当地设立坟墓。驻防旗人亡故后，一律用棺木收敛或火化后

何炳棣用近两年时间撰写了《我对汉化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答复》，对罗斯基予以驳斥。指出罗斯基的许多观点都是似是而非的，并举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都要争“正统”的大量事实，说明少数民族的“汉化”乃是大势所趋。他认为，以清朝来说，汉化的标志就是“儒化”，所以也不妨以“儒化”代替之，而儒化与中国化就是一回事。



送京归旗。统治者担心旗人在当地置产后,形同土著,养成安土重迁的心态;而且驻防兵丁的宗族俱在京师,若准在驻防地造坟立业,年久,旗、民混淆,难于区别,所以才做出如此违背常理的规定。清廷还把修筑满城作为避免“沾染汉俗”、保持八旗传统风俗作为“巩固根本”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所谓“满城”,是特指各省驻防旗人所居城池而言的,驻扎者不但有满洲旗人,还包括蒙古、汉军旗人。修建满城是清廷实施旗、民隔离政策的重要手段。满城与一般兵营、堡寨的区别在于:它不仅是一个军事要塞,而且是当地社会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社区。城内包括军事设施、官衙、居住区、学堂、庙宇;布局亦如京师,旗兵各按八旗方位分左右翼依序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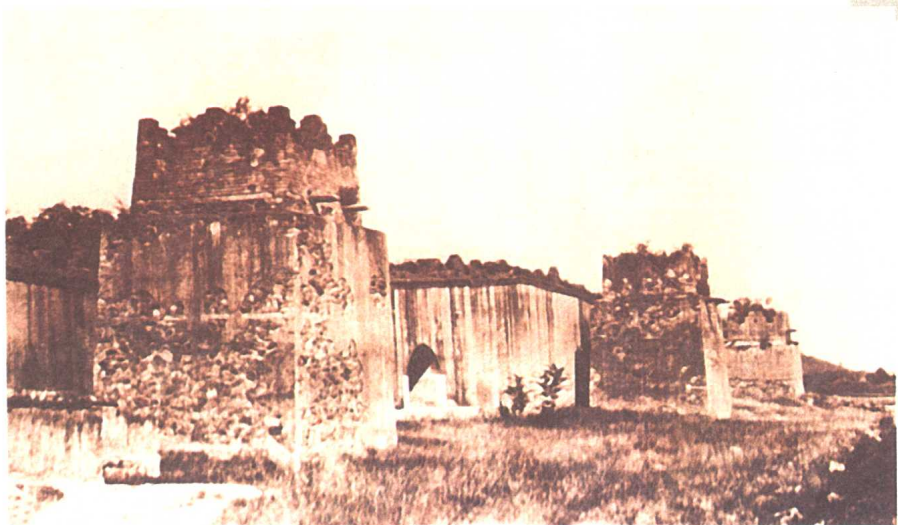


图 11 北京西郊八旗锐健营旧景

清统治者利用这种方式,将驻防旗人和他们的子弟牢牢禁锢在满城狭小的天地里。满族子弟生在满城,长在满城。男子成年后考试合格就在满城内当兵。满城内的旗人平日不准离城 20 里,远出要注册,回城要销假,违限不归按逃旗论处。旗兵的日常生活很单调,以军事训练、出差当值为主要内容;遇有战事,奉命出征。满城内初期没有任何商业,日用所需或靠到附近汉城购买,或靠民人货郎白日进城时添置。民人不准留城中;旗人则不准外出从事农、工、商业。

## 二 满汉的交往与杂居

清朝入居北京后,百般阻挠满人与汉人的正常交往,处心积虑地制造满汉间的畛域,意在利用满族的武力拱卫统治者的宝座,即所谓“满洲乃国家之根本”。但事与愿违,满人倾慕汉人街市繁华,又存在经济、文化交往的现实需要,所以满、汉间的往来很快频繁起来。不过,至少在最初

满洲作为不及汉族人口 1/350 的少数民族,为什么能够征服并维持对中国的统治长达近三百年。郭沫若曾说,清人入主中国二百年实在是一个奇迹。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并非汉族自身,而是不同于汉人的通古斯族系满洲人在中国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里治理中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欧立德《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